

承前启后传技艺

——丁瑜先生对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的贡献

王 沛 林世田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通过人才培养、项目带动等方式，古籍修复事业蓬勃发展，古籍修复人员从之前的不足百人发展壮大至上千人，许多珍贵古籍得到抢救修复，全国修复总量超过360万叶。2020年9月1日，“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首次全国性古籍修复技艺竞赛的成果展示，全国各地百余件参赛作品及珍贵古籍修复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一部部风采重光的珍贵古籍，蕴含着巧夺天工的修复技艺，彰显着生生不息的人才接续，我们不禁再一次想起为新中国古籍保护和修复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老前辈——令人尊敬的丁瑜先生。

古籍修复是一项艺术性极强的手工技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均有创新和发展。历史上众多修复匠人在长期的修复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千百年来只是通过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得以传承，鲜有专门记载技艺的文字，传世文献所载的只言片语多出于藏家、文人之手，既不系统，也不具体。由丁瑜先生与肖振棠先生上世纪60年代合作完成初稿，并不断修改完善，于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是近现代古籍修复领域的开山之作。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筹备开展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丁瑜先生与冀淑英先生，以及方广锴、杜伟生老师等人，吸收古今中外的文献修复经验，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敦煌遗书修复方法，成为今天古籍保护最通行的修复原则。

一、合作完成《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

1961年7月，文化部古旧线装书技术人员学习班在北京图书馆开班，由技

艺精湛的“国手”张士达、肖振棠等担任师傅。1961年11月，丁瑜调入善本部。

丁瑜热心古籍修复技术，利用闲暇时间，虚心向修复师傅请教。1963年12月，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开始筹建，丁瑜被推荐参与其中，作为北图承担的1964—1965年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计划¹“善本书修整装订技术的经验总结与改进”研究项目的召集人，项目成员有肖振棠、张士达、张耀华等。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于1964年初开始撰写，1965年11月完成初稿，与“善本书修整装订技术的经验总结与改进”研究项目几乎同步。丁瑜丰富的版本学知识和对修复技艺的钻研，加上肖振棠先生数十年的修复经验，最终合作完成了这部古籍修复技术的开山之作。然而，初稿完成后遇上“文革”，竟此尘封十余年。

1978年，第一次“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工作会议召开，丁瑜备受鼓舞，重理旧稿。他删掉了一些与装订技术和操作方法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将原稿36节概括为5章15节，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著作系统、详尽地介绍了古籍修复技艺，并着重叙述实际操作方法，为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指南。全书共5章，分别为：书籍装订技术的起源和发展、装修古旧书籍常用的名词、装修古旧书籍应有的设备及常用材料、古旧书籍的修补与装订、古旧书籍的各种不同装修法。书后附装修书籍操作规程、成品检查标准和装修书籍操作统计单。

值得说明的是，该书对古籍修复的“整旧如旧”原则进行了系统总结，为后人践行这一原则提供了指导。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原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1905—1980）先生在1949年5月《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提出“不再改装，以保存原样”，即后人熟知的“整旧如旧”原则。根据赵万里先生的这一要求，经过修复师的妙手，《赵城金藏》才得以最古朴的面貌保留下来。至于当时的“整旧如旧”如何操作，除了分析原物外，我们可以从《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中的详细介绍来一探究竟：“整旧如旧即是为了保持书籍的原始面貌和风格的装修方法”，“不仅要掌握精湛的修复技术，还要具备一些版本知识，了解

¹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32—335页。

不同时代书籍的不同风格，才能达到整旧如旧的要求，使修补过的古书保持原有的面貌。”“整旧如旧装修法”¹小节从8个方面具体介绍了如何做到“整旧如旧”，即：保持旧观的衬纸法、溜口和书角的修补法、书皮和护叶的修补法、扣皮法、包书角、书签修整法、订线和打眼、书套修整法。这些总结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理念，至今仍为古籍修复工作所遵循。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是国家图书馆在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更是我国古籍修复的第一部教材。该书不仅为古籍修复这项传统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及时解决了古籍事业蓬勃开展却苦无教材参考之弊。古籍整理和文物保管单位十分重视此书，纷纷以之作为业务学习教材。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村井田敬在该书出版第二年就译为日文出版。二十世纪末，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何大伟先生又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对西方所藏汉文古籍保护和修复人员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参与制定敦煌遗书修复方案

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0余号敦煌遗书中，有相当数量的卷子存在破损现象。破损较严重的卷子纸张已经老化，一触即碎，甚至完全不能展开阅读。有的卷子曾被泥土、油（古人使用的灯油或蜡油）、水浸泡，变得脆硬、糟朽。每展阅一次，常常掉下来碎渣、碎片²。

二十世纪80年代末，国家图书馆开始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敦煌遗书的修复探索。丁瑜先生与冀淑英先生、方广锴和修复专家杜伟生老师等人，吸收古今中外的文献修复经验，经过多次试验，系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复原则。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如“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整旧如旧”“过程可逆”“最小干预”等的古籍修复原则，都来源于敦煌遗书修复经验的总结提升：

（一）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我馆老一辈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1920-2001）在指导修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最早提出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冀先生认为，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要突出重点，抢救那些影响寿命、

¹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丁瑜《延年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251-255页。

² 张平：《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张志清、陈红彦主编《古籍保护新探索》，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2-188页。

必须修复的地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以保持敦煌遗书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不受损失。由此，敦煌遗书修复方案明确了以“局部修补”为核心的全新修复方法。这一方案成为指导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重要原则，并逐渐为英法等国家修复敦煌遗书所效法。这与文物领域“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方针也是高度一致的。

（二）整旧如旧：“整旧如旧”的方式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有过表述。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而是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赵万里先生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修复《赵城金藏》曾说：“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¹同一时期，梁思成先生在修复古代建筑时也提出“整旧如旧”的理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中，丁瑜先生对“整旧如旧”提出了要求：“对时代较早、有版本价值的善本书籍，须采用整旧如旧的装修法，以保持文物特点。装修时，要求不补字、不描栏、不划栏，不要有求全的思想。对珍贵的古书来说，一字的模糊，或一段界栏的断线，都是考定版本的有力证据。”²

（三）过程可逆：我国传统的修复方法大多没有考虑到可逆性，很多馆藏宋元善本，都曾被后人做了改装。一些善本由蝴蝶装或包背装被改为线装，有些还被裁去天头地脚，使后人失去了研究古代书籍独特装帧形式的可能；过去流落民间的一些敦煌遗书采用了通卷托裱的方式，虽然美观，但却使后人无法看到纸背的信息；西方国家在修复时还曾使用过化学胶水、加膜加网等不可逆的方法，自称为“善意的破坏”。国图在修复敦煌遗书时，坚决摒弃传统的通卷托裱，最大限度地遵循“过程可逆”原则，确保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形态造成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将来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随时恢复原状，改用更为先进

¹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78—485页。

²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丁瑜《延年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251页。

的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书。

（四）最少干预：文物保护领域后来提出的“最少干预”原则，也在实际修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贯彻。不论使用什么修复方法和材料，都会或多或少地改变古籍的原有形态，损害古籍的文物价值。“最少干预”原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修复行为，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保障研究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尽量少修，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在《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中，也体现出了这种思想。在讲到卷轴装时，提出“如果书卷破烂但不糟朽，也未经裱装，则不必在后面裱纸，只要把书叶破烂处用同样纸补整齐，上下亦不需裁切。……尤其对时代较早的古卷轴，更要避免揭裱，因为揭去一层纸，会使正面的自己受到揭裱的影响，而模糊不清。前人曾总结出‘纸去其半，伤字精神’的经验。具体的说，就是古卷轴揭去一层旧纸，另裱一层新纸，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如果裱后再加以裁切，使书品缩小，则受到的损失就更大了。”¹

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尚属首次。回顾世界修复史，即会发现，国家图书馆从敦煌遗书修复中总结出的这些原则，与1964年5月31日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国际宪章》（即《威尼斯宪章》）²以及1979年的《巴拉宪章》³高度吻合。如“最有必要和最少干预原则”“可辨识性原则”“可逆性原则”等，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科学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不难看出，敦煌遗书修复过程中总结凝练的古籍修复原则与国际广泛认可的文物修复原则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也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将中国传统修复的指导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全面总结；另一方面，也要开拓国际视野，“吸收外来，不忘本来”——中外合璧。这也是我们今天开展科学修复的重要原则。

¹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丁瑜《延年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263页。

² 转引自何流、詹长法：《〈威尼斯宪章〉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第1期，第82-89页。

³ 转引自李颖科：《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辨析——兼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1期，第57-64页。

在古籍修复事业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需要铭记以丁瑜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他们在新中国崛起的发展历程中，探索的不仅仅是图书馆事业，更重要的是以“心有华夏”的大胸怀，为中华珍贵典籍的保护、传统技艺的延续甘为人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